

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

龚 关

内容提要 清末到民国前期是华北集市的| 个重大发展时期,表现为集市数量大幅度增加,集市网络层级结构更加分明,其功能也有重大变化。同时,这| 时期也正是华北地区集镇的勃兴时期。集市的发展和集镇的勃兴同步进行,集镇的勃兴并没有使集市黯然失色,集市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既是华北地区在近代尤其是清末到民国前期商品化快速发展的| 个侧面反映,也是华北区域市场发展迥异于江南地区的| 个特点。

关键词 近代 华北地区 集市

作为传统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集市,在华北区域市场中有其独特的地位与功能。在近代,它又被融入近代意义的市场体系之中,其功能也随之有了发展变化。国内外学者对华北集市已有较为

* 本文所指的华北在地域上大致相当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则主要包括晋、冀、鲁、豫四省。山西、河北两省在民国前后政区有较大的变动,清代山西所属的绥远城厅、清水河厅、萨拉齐厅和林格尔城厅、托克托城厅、丰镇厅等6厅民国初年从该省分离出去,本文在统计时以民国时期山西版图为准;河北省的宣化府、承德府、张家口厅于1914年划归察哈尔和热河,本文在统计河北集市数时,依照民国时期的河北版图。山东、河南两省在民国前后版图变动不大。

深入的研究^①，但多集中于明清时期，对其在近代的发展变化则语焉不详，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华北市场研究的一个缺陷。本文试图对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状况作一研究，有时也作必要的向上追溯。

一、集市的集期分析

一般来说，居民赶集不仅仅限于最近之集，附近各集乃至较远的大集都是人们进行交易的场所，商人更是频繁来往于各集市之间，因此，为了便于人们赶集，临近各集在集期的安排上往往是相互错开的。在河北（河北在1928年之前称为直隶，本文在行文时一律称河北）新河，“农村交易……均有定期以通有无，各市日期交错，概皆五日一市，如甲村之市每逢月之三八日，乙市则二七日，丙市则为十五日”^②；杨庆堃于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邹平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临近各集的集期是各不相同的，以免冲突。地方人立集的习惯，是五里内不许有相同的集期的。”^③当然，5里内不许有相同的集期是就大体而言的，其实地方集市空间分布疏密不同，两集相距不一定就是5里，但一般都遵循相邻集期相互错开这一原则。一些地方把这一现象称为“插花集”。同样道理，相邻的大集之间集期往往也是错开的，但也不排除有相同的，中村哲夫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河北深州一般各大集之间集期都是错开的，但相距约5公里的玉章市集和王家井集都是二、七日开集，不过玉章市属

① 国外学者对华北地区集市有较深入研究的有日本学者山根幸夫、中村哲夫、石原润等，国内学者许檀研究了山东的集市，王兴亚则研究了河南的集市。

② 民国《新河县志·食货门》。

③ 杨庆堃：《一个农村市集调查的尝试》，1933年7月8日《公报》。

于深州城这个中心市场,而王家井则从属于别的中心市场。^①

由于相邻各集的集期一般是相互错开的,因而在一县之内往往每天都有几个集市开市(见表1)。

表1 清末至民国年间华北各地集市开市日期统计表

地 区	集市数	一旬之中每天开市集数										平均每天开集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河北宁津	30	5	6	6	6	7	5	6	6	6	7	6.0
河北满城	20	5	3	4	6	5	5	6	5	4	7	5.0
山东茌平	31	7	8	4	6	8	7	8	4	6	8	6.6
山东掖县	69	13	16	11	14	15	13	16	11	14	15	13.8
山东潍县	93	22	19	22	25	22	22	20	22	25	23	22.2

资料来源:光绪《宁津县志》、民国《满城县志》、民国《茌平县志》、民国《掖县志》、民国《潍县志稿》。

表1显示,不论是集市数较少的县,还是较多的县,每天所开集市之数都接近于平均数,这正显示出人们在集期设立上的巧妙,也给人们提供了交易的方便,“人们有需要就可一天赶一集,这对于游行商人又很便利,他们可以一天赶一集”^②。无论是农民、手工业者,还是往来各集之间的商人,都从相互交错的集市中获得了较大的时空选择余地。

从集市的开市频率看,华北地区基本上呈现每日集、隔日集、十日四集、十日三集及五日一集并存的格局。但各地集市的开市频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见表2)。表中统计显示,清末至民国年间,

① 中村哲夫:《清末华北的农村市场》,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199页。

② 杨庆:《一个农村市集调查的尝试》,1933年7月8日《公报》。

华北各地集市开市频率大致可分三种情况：(1) 山东、河北两省以五日一集为主，其中山东 90% 以上都是五日一集；(2) 山西以隔日集为最多，占近一半，其次是每旬三集、二集，共占近一半；(3) 河南则近 90% 为隔日集。也就是说，在集市的开市频率上，山西要比河北、山东高，而河南比山西更高。一般认为集市的开市频率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是成正比的，但就华北地区来看，这二者之间并不必然表现为正比的关系。山东在华北诸省中经济发展和商品化程度是最高的，其次为河北、河南，而山西显然不及另三省。那么，该如何解释华北地区在集市开市频率上这一反常现象呢？

表 2 清末至民国年间华北各地集市开市频率统计表

地区 项目 开市频率	山 东		河 北		河 南		山 西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每日集	6	0.93	5	0.64	48	8.57	7	3.38
每旬五集	3	0.47	45	5.77	495	88.39	89	43.00
每旬四集	40	6.20	82	10.51	17	3.04	5	2.42
每旬三集	4	0.62	28	3.59			48	23.19
每旬二集	592	91.78	620	79.49			50	24.15
每旬一集							8	3.86

资料来源：山东：光绪年间《临朐县志》、《磁阳县志》、《高唐州乡土志》，民国年间《化县志》、《夏津县志》、《冠县县志》、《长清县志》、《茌平县志》、《博山县志》、《牟平县志》、《济平县志》、《福山县志》、《藜阳县志》、《观城县志》、《掖县志》、《馆陶县志》、《齐东县志》、《昌乐县志》、《东阿县志》、《德平县志》、《潍县志稿》等 21 部；河北：光绪年间《蠡县志》、《侯桥县志》、《乐亭县志》、《安国县新志稿》、《涞水县志》、《容城县志》、《宁津县志》、《滦州志》、《藁鹿县志》、《阜城县志》、《蓟州志》、《密云县志》，民国年间《交河县志》、《文安县志》、《良乡县志》、《东明县续志》、《临榆县志》、《威县志》、《雄县新志》、《阮氏县志》、《景县志》、《卢龙县志》、《满城县志》、《柏乡县志》、《徐水县新志》、《南皮县志》、《昌黎县志》、《望都县志》、《霸县新志》、《清苑县志》、《平谷县志》、《清河县志》、《藁

宫县志》、安次县志》、广平县志》、定县志》、新城县志》、新乐县志》、《通县志要》、香河县志》、盐山新志》、藁城县乡土地理》、宁晋县志》、静海县志》、广宗县志》、脍县志》、沧县志》等 47 部；河南：光绪《归州志》，民国年间《密县志》、《封丘县续志》、《柯阴县志》、《续安阳县志》、《淮阳县志》、《商水县志》、《扶康县续修志》、《重修信阳县志》、《西华县续志》、《鄱陵县志》、《中牟县志》、《林县志》、《阳武县志》、《荥阳县志》等 15 部；山西：光绪年间《平陆县志》、《清源乡志》、《徐沟县志》、《繁峙县志》、《陵川县志》、《长子县志》、《寿阳县志》、《平定县志》、《代州志》、《文水县志》、《五台新志》、《续修崞州志》、《歙济县志》、《长治县志》、《定襄县补志》、《平定州志》、《侯丘县补志》、《屯留县志》、民国年间《岳阳县志》、《临县志》、《沁源县志》、《合河政纪》、《武乡县志》、《襄垣县志》、《榆次县志》、《介休县志》、《沁源县志》、《荣河县志》、《灵石县志》等 29 部。

要弄清这一问题，需要联系集市的各相关要素作综合分析。影响集市开市频率的因素首先当然是市场交易规模的大小，但是集市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因而影响集市开市频率的因素，除市场交易规模外，还有自然地理条件、人口规模、风俗习惯以及集市的空间分布密度等。正是由于影响因素的多样性，造成了各地集市开市频率的复杂性。下面就华北地区集市开市频率的三种类型，分别加以比较分析（见表 3）。先比

表 3 华北各地集市空间分布密度表

地 区	土地面积 (km^2)	1861- 1911			1912- 1937		
		集市 总数	平均每集 覆盖面积 (km^2)	平均每 集半径 (km)	集市 总数	平均每集 覆盖面积 (km^2)	平均每 集半径 (km)
山 东	146736	3139	46.75	3.9	4253	34.50	3.3
河 北	140253	1861	75.36	4.9	2652	52.89	4.1
河 南	165141	3031	54.48	4.2	4024	41.04	3.6
山 西	156419	805	194.31	7.9	808	193.59	7.8

资料来源：各省土地面积据《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119、111、125、133 页；集市数量见下文表 4、5、6、7。

较山西与河北、山东。山西的集市开市频率要高于山东、河北,但同时山西集市的空间分布密度要低于山东、河北,造成集市空间分布密度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口密度、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都是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只有达到一定的交易规模才能维持一个集市的存在,因而像山西这样山区面积较大、人口密度较小、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需要有更大的覆盖范围来维持一个集市,由于集市的覆盖范围大,如果开市频率低,便不能满足人们交易的需要,因而需要多置集期;而山东、河北地处华北平原,人口密度大、经济发展程度较高,集市的空间分布密集,尽管开市频率较低,但由于集市的覆盖范围小,临近之集都可以赶,集市空间分布密集弥补了开市频率低的不足。看来必须综合集市的时间、空间分布来衡量一个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再比较河南与山西、山东、河北等省。河南的集市开市频率要高于山西,这可用两地的经济发展差距来解释;而河南与山东、河北相比,在经济发展上处于同等水平或稍有差距,这三省集市的空间分布密度相差不大,可是河南集市的开市频率则要高得多,也就是说综合集市的时、空分布,河南总体的集市交易频率要高于河北、山东。此中原因确实值得深思。笔者认为,风俗习惯当是一个重要原因。笔者在检阅各省明中后期以及清前期县志时,发现这段时间各地集市开市频率已各具特色,山东、河北五日一集较多,而河南隔日集较多。至于明清时期各省集市开市频率为什么会呈现出各自的特色,自有其经济生态原因,这有待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另外,从翰香先生对河南有较高的集市开市频率的解释可作参考,从先生认为“除传统习惯外,该省集镇有固定铺面的商号数量不多,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农村土产外销和乡村居民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都不得不仰

赖经常性的集市贸易。^① 总之,华北地区集市开市频率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二者的关系较为复杂,很难简单地认为二者之间成正比或反比关系。集市开市频率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二、集市的数量分析

我们首先估算各个时期集市的数量,进行估算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各州县不同时期的县志,其中山东、河北的数据采自吉尔伯特·罗兹曼的《清代中国的人口和市场聚落》一书,该书附录把明中叶到民国年间分为5个时期,分县罗列了作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时期的集市数量;河南、山西两省数字由笔者逐县查阅所能搜集到的各地县志后获得,为了保持一致,在统计上也分为5个时期。

表4 明清至民国时期山东集市统计表

年 代		1550- 1734	1736- 1795	1796- 1861	1862- 1911	1912- 1937
已搜集 到资料 的县的 情况	县 数	43	50	27	47	48
	集 市 数	606	970	608	1379	1908
	平均每县	14. 1	19. 4	22. 5	29. 3	39. 8
	集 市 数					
省 籍 县 数		104	107	107	107	107
推算集市数		1466	2076	2409	3139	4253

资料来源: Gilbert Rozman: *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Settlements in Ch'ing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36- 138.

① 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另外，一些县志中的文字描述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观察集市发展的态势。依据原始数据，我们做出各省明清至民国时期集市统计表(见表4、5、6、7)。

表5 明清至民国时期河北集市统计表

年 代		1550- 1734	1736- 1795	1796- 1861	1862- 1911	1912- 1937
已搜集 到资料 的县的 情况	县 数	79	56	20	76	53
	集市数	730	678	256	1088	1081
	平均每县 集市数	9.2	12.1	12.8	14.3	20.4
省 辖 县 数		130	130	130	130	130
推算集市数		1201	1574	1664	1861	2652

资料来源: Gilbert Rozman , *op. cit.*, pp. 134- 136.

表6 清初至民国时期河南集市统计表

年 代		1644- 1734	1736- 1795	1796- 1861	1862- 1911	1912- 1937
已搜集 到资料 的县的 情况	县 数	22	30	45	18	16
	集市数	401	796	1228	510	580
	平均每县 集市数	18.2	26.5	27.3	28.3	36.3
省辖县数		108	108	108	107	111
推算集市数		1969	2866	2947	3032	4024

资料来源: 康熙年间《陈留县志》、《商邱县志》、《歙城县志》、《仁蔡县志》、《兰阳县志》、《郟县志》, 乾隆年间《雒县志》、《襄城县志》、《中牟县志》、《汲县志》、《林县志》、《济源县志》、《获嘉县志》、《仪封县志》、《新安县志》、《直隶陕州志》、《郟州志》、《沈丘县志》、《商召县志》、《光山县志》、《新蔡县志》、《信阳州志》, 嘉庆年间《安阳县志》、《浚县

志》、《涇阳县志》、《汝宁县志》、《鲁山县志》、《密县志》、《续济源县志》、《洛阳县志》、《息县志》、《藁城县志》、《正阳县志》、《南阳府志》,道光年间《伊阳县志》、《汝州全志》、《修武县志》、《许州志》、《鄱陵县志》、《伏康县志》、《柯内县志》、《武陟县志》、《淮宁县志》、《扶沟县志》、《辉县志》、《泌阳县志》、《禹州志》、《舞阳县志》、《宝丰县志》,咸丰年间《浙川县志》、《郟县志》,同治年间《中牟县志》、《霁县志》,光绪年间《淮县志》、《内黄县志》、《永城县志》、《襄城县志》、《陕州直隶志》、《庐氏县志》、《鹿邑县志》、《宜阳县志》、《扶沟县志》、《祥符县志》、《涪川县志》、《镇平县志》、《南阳县志》、《兖州志》,宣统《陈留县志》,民国年间《密县志》、《西华县续志》、《鄱陵县志》、《中牟县志》、《蔡阳县志》、《林县志》、《阳武县志》、《封邱县续志》、《柯阳县志》、《续安阳县志》、《内黄县志续修清稿》、《淮阳县志》、《藁水县志》、《伏康县续修县志》、《重修信阳县志》。

表7 清初至民国时期山西集市统计表

年 代		1644- 1734	1736- 1795	1796- 1861	1862- 1911	1912- 1937
已搜集 到资料 的县的 情况	县 数	14	27	31	32	18
	集市数	83	187	228	255	144
	平均每县 集市数	5.93	6.93	7.35	7.97	8.00
省辖县数		101	101	101	101	101
推算集市数		599	700	743	805	808

资料来源:康熙年间《告州志》、《文水县志》、《介休县志》、《隰州志》、《保德州志》、《定襄县志》、《临县志》,雍正年间《定襄县志》、《漪氏县志》、《校补洪洞县志》、《兴县志》、《伏原县志》、《辽州志》、《沁州志》,乾隆年间《蒲县志》、《广灵县志》、《万泉县志》、《长治县志》、《絳县志》、《寿阳县志》、《蒙河县志》、《介休县志》、《潞安府志》、《临晋县志》、《武乡县志》、《和顺县志》、《五台县志》、《解州安邑县运城志》、《赵城县志》、《保德州志》、《襄垣县志》、《高平县志》、《新修曲沃县志》、《汾阳县志》,嘉庆年间《左云县志》、《长子县志》、《介休县志》、《灵石县志》,道光年间《阳曲县志》、《壶关县志》,咸丰年间《汾阳县志》,同治年间《稽山县志》、《柯曲县志》,光绪、民国年间除表2所列29部外,还

有光绪年间《榆社县志》、《蒙河县志》、《永宁州志》、《沁水县志》、《郟县志》、《平遥县志》、《忻州直隶州》、《告州全志》、《襄乡县志》、《和顺县志》、《闻喜县志》、《蒲县志》、《翼城县志》、《续修汾西县志》,民国年间《和顺县志》、《翼城县志》、《平陆县续志》、《安泽县志》、《潞城县志》、《洪洞县志》。1796-1861年间所得原始数据不足,该时段无资料的州县以相邻时期各县资料补入。

根据统计及有关资料,我们可大致看出华北地区集市的发展脉络。明末清初,战乱长达数十年,自然灾害也连绵不断,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史载当时北方各省乱久民稀,土地荒芜,如地处中州的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山东也是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社会经济残破,使集市的发展遭受重创,数量大减,即使存留下来也显得十分萧条。我们无法用统计资料显示这一时期集市减少的准确数量,但可从某些县志的记载中略见一斑。如山东濮州,明后期有集市30余处,经明末清初变乱,有2/3以上的集市“市椽无存,故址付之蔓草”,或“仅存一二颓椽败瓦”,有幸保存下来的几个集市也是“无南北聚货,市肆不过豆米麦及牲畜,较之昔已径庭也”^①;河南淇县明代“旧有集场九处”,清初“仅存北关一处,其余俱废”^②;河南淅川县,顺治年间“村落丘墟,所存于市者,仅一二焉”^③;商城县明末有集市28处,清初仅存7处,其余21处悉残于兵火^④;山西吉州在明代有集5处,而康熙十二年州志载只州市1处,其他4镇过去“俱有集场,今废”^⑤。集市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长期处于萧条、荒废状态,直到康熙中叶才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发展得以逐渐复苏,在康熙雍

① 康熙《濮州志》卷1,《跋郡治考后》。

② 顺治《淇县志》卷1,《集市》。

③ 康熙《淅川县志》卷1,《建置志·镇集》。

④ 嘉庆《商城县志》卷3,《建置志·集店》。

⑤ 康熙《告州志》卷上。

正年间已差不多恢复到明后期的水平。据统计,河北(关内)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平均每州县集市为 9.4 个,清初顺治至雍正年间则为 10.1 个,已恢复到明后期水平,而清中叶乾隆至道光年间则为 14 个,集市数量有了增长;山东明代平均每州县集市为 16.8 个,清康熙年间为 17.6 个,清中叶的乾隆至道光年间为 21.4 个,显示的情况与河北相似。^①

表 8 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各地平均每州县集市统计表

年代 项目 地区	1550- 1734		1736- 1795		1796- 1861		1862- 1911		1912- 1937	
	数量	增幅%	数量	增幅%	数量	增幅%	数量	增幅%	数量	增幅%
山 东	14.1	—	19.4	38.71	22.5	16.02	29.3	30.34	39.8	35.67
河 北	9.2	—	12.1	31.52	12.8	5.79	14.3	11.72	20.4	42.66
河 南	18.2	—	26.5	45.60	27.3	7.92	28.3	3.66	36.3	28.28
山 西	5.93	—	6.93	14.40	7.35	6.06	7.97	8.44	8.00	0.38

资料来源: 本文表 4、5、6、7。

自康熙雍正年间得到恢复后,华北地区集市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平稳发展时期,而自清末到民国前期(即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 30 年代),除山西外,华北地区多数地方进入一个集市数量大幅度增加的时期。有些地区集市的增加非常显著,如河北清苑县清末只有集市 31 个,民国年间达到 62 个,增加了 1 倍;昌黎县清末有集市 12 个,民国年间达到 30 个;青县清末有 9 个,民国年间为 22 个;山东德州清末为 29 个,民国年间为 46 个;泰安清末为 53 个,民国年间为 107 个;商河清末为 33 个,民国年间为 72 个;高密清末为 24 个,民国年间为 66 个。^②慈鸿飞根据河北省 16 个县的资料

①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② Gilbert Rozman, *op. cit.*, pp. 134- 138.

计算得 20 世纪 30 年代河北集市数要比 19 世纪下半叶增长 78.6%^①，这一估计或许有些偏高，但 20 世纪初到 30 年代集市增幅之高是自明清以来到 19 世纪末所没有的，这是一个事实，表 8 中河北、山东、河南的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这与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相吻合的。正是由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使市场商品交易量大幅增加，原有集市远不能满足需要，因而导致集市数量的大幅度增加。

接下来估算一下不同时期华北地区的集市总量(见表 9)。从表中可以看到，清中叶华北地区集市总数在七八千左右，清末达到近 9000 个，而民国前期则达 12000 个左右。到民国前期，华北地区平均每千平方公里约有集市 19.3 个，若就华北平原的冀鲁豫三省来说，则达 24.2 个，这表明华北地区的集市网络已具有相当密度。

表 9 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地区集市数量统计表

年代 地区	1550- 1734	1736- 1795	1796- 1861	1862- 1911	1912- 1937
山 东	1466	2076	2409	3139	4253
河 北	1201	1574	1664	1861	2652
河 南	1969	2866	2947	3032	4024
山 西	599	700	743	805	808
总 计	5235	7216	7763	8837	11737

资料来源: 本文表 4、5、6、7。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到民国前期正是华北地区集镇的勃兴时期。^② 与此同时，集市的数量也有了大幅度增加，集市与集镇同步

① 慈鸿飞:《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② 《近代冀鲁豫乡村》，第180页。

得到发展,这与江南地区正好形成鲜明对比。江南地区明清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导致市镇的勃兴和极大发展,市镇在市场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定期性集市贸易退居次要地位。华北地区集市与集镇的大发展主要是在20世纪初三四十年间,最早也只可往前推到19世纪后期,而江南地区的这一进程最早可推至19世纪初,“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江南市镇进入了一个快速成长的极盛时代,而以表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及杭州湾附近各地最为深刻^①”。很显然,华北地区市镇的发展表现出迟滞的特点。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与江南地区相比,华北地区市场的发展为什么会表现出这样的特色和差异呢?我们试图在对华北地区和江南地区的对比分析中寻求答案。

直接影响一个地区市场发展的因素,在于这个地区能为市场提供多大规模的商品交易量,而在商品交易量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则是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经济结构。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商品交易量成正比,而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会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程度的商品化水平,从而影响市场商品交易量。江南地区由于人口的压力、重税的负担以及市场经济利润的驱动,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业、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已相当发达。松江府及太仓州所属各县棉花的种植面积平均占各县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松江府为中心的棉纺织专业地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棉花的种植与加工已有了相当专业化的分工现象,在某些地区纺纱业与织布业也渐渐分离,并形成地方特产。正因如此,江南

①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的棉花与棉布,自明代起其市场就几乎遍布全国。蚕桑则是太湖流域及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专业性商品作物,浙江75县中,产蚕丝者58县,丝织业也因此而发达,浙江生丝出口量历年均为全国第一。经济作物棉花、桑蚕的种植扩大必然排挤粮食的生产,因此这个历史上著名的粮食产地发生了粮食严重不足的现象,需要从长江中上游各省输入粮食。棉花、棉布以及生丝形成了全国乃至海外市场,而江南的粮食则需要全国市场供应,从而为江南众多的棉业、丝业、粮食业市镇的勃兴提供了基础。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的开埠通商,对外贸易扩大,进一步刺激着江南经济的发展,从而导致19世纪中叶以后江南市镇的快速成长。^①华北地区在清末至民国前期终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突出表现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前所未有的发展。农业商品化的进程从经济作物的种植开始,进而延及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棉花、花生、大豆、烟叶、柞蚕丝等种植面积扩大,且达到相当程度的专门化,其中尤以棉花最为突出,各省逐渐形成几大产区,如河北的西河棉区、御河棉区、东北河棉区,山东的鲁西、鲁北棉区,河南的豫北、豫西、豫东棉区,这些棉区在各省的棉花产量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棉花种植的相对集中使得有些县的棉田占耕地面积的比例高达50%,少数甚至达70%—80%。^②经济作物种植的区域化直接导致粮食生产的商品化,一方面,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使一些地区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仰赖于产粮区的供应;另一方面,粮食生产也逐渐商品化,甚至也有区域化的趋势。在华北地区,“小麦在农家已成为半

① 关于江南市镇的背景分析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72页;近代江南市镇快速成长的因素参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4年版,第125—126页。

② 关于经济作物种植的专门化详见从翰香《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清末民初华北平原冀鲁豫三省的农村》,《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商品作物”^①。山东惠民县有 72% 的小麦用于出售,河北盐山农家自用的小麦仅占 5%^②,“山西出产着大量上等级的小麦,输出到邻省甘肃和陕西”^③。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更显示着华北地区的商品化进程和程度,尽管一部分手工业如制铁业、纺纱业在西方经济侵略的冲击下逐渐衰落,但织布业、花边业、轧棉业、草帽辫业、酿酒业等迅速发展,尤其是棉织业,华北的多数地区以此为主要的家庭手工业,而且由于新的生产工具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这一行业的发展,形成了众多的棉布产区,其中以河北高阳、宝坻,山东潍县等产区最为著名。棉布的产量和商品量迅速增长。鸦片战争前夕,冀鲁豫三省进入长距离运输的商品布不过 300 万匹,清末达 2000 万匹,民国以后增长更快,1928 年仅河北一省农民家庭棉纺织业便产布 2533.42 万匹。1931 年华北棉布业进入低潮时,河北全省棉布产量仍达 1834 万匹。1935 年,河南省全年棉布总产量达 1059 万匹,同年山东省家庭棉纺织业的总产量在 2000 万匹左右。^④ 以上分析表明,清末到民国前期华北地区各种农作物和手工业品产量的增长,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促使华北地区商品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这正是华北地区这一时期市镇勃兴的社会经济背景。

然而从与江南地区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华北地区的差距。从市镇来看,20 世纪初江南地区市镇总数约为 1383 个,平均每千平方公里有市镇 27.8 个,约每 36 平方公里就有 1 座市镇,市镇间距约为 6 公里;而华北平原冀鲁豫三省在民国时期大约有重要集镇 2248 个,平均每千平方公里有集镇 5.2 个,每 193 平方公里有 1

① 叶笃庄:《华北棉产及其增产问题》,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 1948 年刊印,第 8 页。

②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 1933 年版,第 634 页。

③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28 页。

④ 《近代冀鲁豫乡村》,第 368-369 页。

座集镇,集镇间距约为14公里。江南地区的市镇密度是华北地区的5.3倍。^①市镇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一定数量的人口为基础的,江南地区明清以来一直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19世纪20年代松江府甚至达每平方公里近1200人^②,相比之下华北地区人口密度要小得多,甚至华北地区人口密度最高的山东在20世纪30年代也只有二百六七十人左右,与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相比仍有相当差距,两个地区市镇的勃兴有着不同的人口背景。另一方面,江南和华北地区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业区,江南的灌溉农业与华北的旱作农业形成鲜明的对比,江南以灌溉农业的优势获得了较华北地区更高的人均产量,加上遍布的水路交通,造就了江南小农经济的高度商品化。^③而人口的压力则更推动了商品化的发展,由于人口的压力,江南地区的劳动力比华北地区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也使需要较多劳动力的棉花的种植、能够充分利用空闲劳动力和辅助性劳动力的桑蚕业和棉纺织、丝织等手工业得到充分发展^④,因而两个地区的商品化程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棉花的种植为例,明清时期江南的松江府及太仓州棉花的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达百分之六七十,而20世纪30年代河北省的棉区中也只有部分县棉田占耕地面积的50%。^⑤人口密度和商品化程度的差异形成了两个地区不同密度的市镇网络。

由于市镇密集,而市镇有着较多的店铺、行栈和较好的交易设施,江南地区集市的一些交易功能被市镇所吸纳,集市交易退而成

① 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② 《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59页。

③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42-43、60页。

④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42-43、60页。

⑤ 从翰香:《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清末民初华北平原冀鲁豫三省的农村》,《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为主要满足居民生活消费需要的场所。清末至民国前期华北地区集镇勃兴,不过集镇较低的密度显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需要,而华北的人口密度和商品化程度限制了集镇的进一步增长,因而为集市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另一方面,华北地区的商品化发展程度还不足以为集市突破时间限制提供足够的交易量,因而长期延续下来的定期交易的习惯得以保持,但原有集市又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需要,于是便出现这样的现象:在集镇勃兴的同时集市大量增加,而大量新增集市的开市频率主要依各地集市开市频率的习惯而定,日益增长的交易需要不是通过增加集市的开市频率,而是通过开设新的集市来满足。我们在这里看到集市的平均开市频率不再增加甚至有所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另外,华北地区集镇勃兴在 20 世纪初,比起江南地区市镇的快速成长始于 19 世纪中期要晚,这主要在于两个地区受西方经济侵略、国际市场冲击的影响在时间上有早晚,江南地区自上海开埠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后,这种影响已相当深入;而华北地区虽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天津、烟台已相继开埠,但西方经济侵略直到八九十年代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集市的结构与功能

集市最基本的功能是满足农民、手工业者日常交易的需要,在他们之间调剂余缺,从而维持小生产的正常进行,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以这一最基本的功能为基础,集市还具有一些其他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华北区域市场的发展变化,集市因结构的变化,其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

集市向有分区交易的习惯,根据交易物品的不同种类各自相对集中于一定的区域,以方便交易。因各地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差

异,一般集市在“百货具备”中总有一定种类的物品交易量较多,这是自明清以来直到近代华北各地集市的普遍规律。明清时期商品化的发展,已使某些集市交易规模扩大,如华北地区许多地方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贸迁者牵牛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负絮纷如,售钱缙易盐米。”^①以出售某一种或几种商品为主的专业性集市也随之出现,有的甚至规模相当可观。如山东夏津县县城,“自丁字街口又北抵北门皆为棉花市,秋成后,花绒纷集,望之如荼,否则百货不通”^②;齐东县“民皆抱布以期准集于市,月凡五六焉,交易而退,谓之布市,货通关东,终岁且以数十万计”^③。集市交易规模的扩大,专业集市的出现与发展,使得集市已呈现出一定的层级结构。清中叶的一些县志记载中有大集、小集之分,如嘉庆《长垣县志》载该县有大集14,中集10,小集8,另还有许多村落小集,未予记载^④;山东长清县有10处大集,26处小集^⑤;河北河间县,“四乡大集七处,小集二十七处”^⑥。除定期集市有大小之分外,庙会也有大小之分,如山西太谷“四乡商贾以百货至,交易杂沓,终日而罢者为小会。赁房列肆,裘绮珍玩,经旬匝月而市者为大会”^⑦。山东邹平每年四月六日至八日的黄山会,俗称大集,“四方商贾赍百货,俱集东门交易。自庙外至山脚……农具、诸家器用物,溢路铺设里余”^⑧。大集规模较大,

① 方观承:《棉花图·收贩·跋语》,乾隆十八年刻本。

② 乾隆《夏津县志新编》卷2,《建置志》。

③ 康熙《齐东县志》嘉庆增刻本,《齐东县志续·布市记》。

④ 嘉庆《长垣县志》卷6,《建置书》。

⑤ 道光《长清县志》卷2,《地輿志》下。

⑥ 乾隆《河间县志》卷1,《地輿志》。

⑦ 光绪《太谷县志》卷3,《风俗》。

⑧ 康熙《邹平县志》卷8,《杂志·风俗》。

实际覆盖面积也较大,处于较高层次,小集则处于较低层次。这样,清代中叶华北地区已存在一个显示出不同层级的集市贸易网络。这一集市贸易网络除了调剂余缺的基本功能外,一些集市尤其是大集还具有在一定范围内集散物资的功能,从而成为长距离贸易的基础,这样,集市网络与其他层次的市场一起共同发挥着在不同地区间配置资源的作用。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初步形成一定层级结构的集市贸易网络。另一方面,从整个华北区域市场来看,它还是以小生产为基础,尽管存在区域内以及与其他区域间的一定规模的长距离贸易,如山西的铁器行销华北各地乃至其他地区,华北地区一些地方的棉布大量销往东北、蒙古、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但是整个区域市场由于受交易规模、交通运输状况乃至生产方式的制约,市场发育受到限制,各级市场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紧密,因而不仅对于附近居民来说,集市主要是一个余缺调剂的场所,而且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小生产者来说,集市也是进行余缺调剂的一个环节,其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局限。

清末到民国年间,华北地区集市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因商品化的发展,市场商品交易量增加,一些集市的规模随之扩大,集市的结构也相应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专业集市大量涌现。由于这一时期华北地区商品化发展最突出地表现为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以及棉纺织业的发展,因此涌现出许多棉业集市,如山东高唐“查各集贩卖,花布居多……即如花市一项,每集贸易者,多至数十万斤”^①;河北束鹿“旧城一市,为棉花萃集之区,每年销售不下二百万斤”^②;河北高阳棉织区,由于棉织业的发展,形成了高阳城集、大庄镇集、莘桥镇集、青塔镇集4个棉织中心集市,进行棉纱与棉

① 光绪《高唐州志》卷3,《田赋考·税课》。

② 光绪《束鹿县乡土志》,《商务志》。

布的交易^①；山东清平县大丁庄集“为本境最大棉市，八九月间每集销数千包”^②；据刘家 1922 年对河北西河棉区 30 县的调查，有近 20 个县出现了“花市”，每个县的花市数目，多到 10 处、8 处，少也有四五处。^③ 其他专业集市也有不少，如粮食专业集市，山西徐沟县清源乡“市集，城内粮市在东城察院街；高白镇集逢单日开集，粮市在中截堡内”^④；河北青县兴济镇，逢一、六日集，“秋间上市粮石车辆动达数千，为卫河上下所仅见”^⑤；河北满城石井集，逢四、七、十日开集，“粮为大宗，多由邻县运来”^⑥；河北昌黎，“各市集买卖粮石为大宗，布匹次之”^⑦。蔬菜专业集市，山西清源县，“瓜果蔬菜产额极多，年可收入三十万元，销售于各县，其行销于省城者亦多，该县有菜市，每二日逢一集，各县趸买者咸集于此”^⑧。再有牲畜、农具等集市，牲畜市如山西翼城县“中堡村，牲畜集”^⑨；河北香河县集“一七为大集，牲畜极多”^⑩。农具集市如河北徐水县有 15 处庙会专售或兼售农具。^⑪ 专业集市的发展以生产的专业化为

① 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纺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进程》，《中国农村》第 1 卷第 3 期，1936 年。

② 民国《续修清平县志》卷 5，《实业篇》。

③ 刘家：《直隶棉业调查录》，《农商公报》第 90、91、92 期，转引自从翰香《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清末民初华北平原冀鲁豫三省的农村》，《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

④ 光绪《清源乡志》卷 9，《都甲》。

⑤ 民国《青县志》卷 1，《舆地志》。

⑥ 民国《满城县志》卷 3，《建置》。

⑦ 民国《昌黎县志》卷 2，《地理志》。

⑧ 山西省政府视察股：《山西省各县物产调查表》，1932 年刊印，第 4 页。

⑨ 民国《翼城县志》卷 2，《疆域》。

⑩ 民国《香河县志》卷 1，《疆域》。

⑪ 民国《徐水县志》卷 4，《建置记》。

基础,这不仅限于大宗的商品,某一地区一两种特种产品的大量生产也产生相应的专业集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山东莱芜,“各重要市镇,以及莱芜城的東西两关,或五天一集,或十天一集,每个集上,姜、麻市常占最重要的地位。姜、麻市上的交易,实质上恐怕占一集交易的总额之十分七八”^①。

在专业集市发展、集市密度增加的基础上,集市的层级结构更加明显,大小集之分更为普遍。首先,一些集市本身有大集、小集,如河北乐亭阎各庄二、八日为大集,五日为小集,该县还有其他4个集市与此类似^②;河北交河泊头镇五、十大集,三、八小集,高川四九大集,二七小集^③。而大小集更多是指在某一地区范围内的集市有大小之分。区分大小集,一是看是否有牲畜交易。如河北威县,“大集十,凡市中有买卖牲畜场所名为大集;小集二十五,凡市中无买卖牲畜场所名为小集”^④;河北元氏县,“旧例集市有骡马市为大集,过集日期城守营派兵防范匪人,俗称四大镇,其他小集皆不派兵弹压,小集亦无骡马市”,小集有25个。^⑤二是根据集市交易规模的大小。如河北东明,“城南之杜胜集、东明集,城东之王浩屯集、五伯岗集,城东北之海头集,商业较为繁盛,其余均不过肩挑小贩暂为聚会,小顷即散”^⑥;山东临清“大集竟日成市,小集过午即散”,“各区集市计34处,以花粮兼牲畜者为最大,花粮次之,其专营粮市或花市者又次之”^⑦;山东清平县,共16集,“除城集不计

① 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35页。

② 光绪《乐亭县志》卷3,《地理》。

③ 民国《交河县志》卷1,《輿地》。

④ 民国《威县志》卷8,《政事志》。

⑤ 民国《元氏县志》,《疆域略》。

⑥ 民国《东明县新志》卷5,《建置》。

⑦ 民国《临清县志》,《经济志·商业》。

外,乡区之集以康庄、新集、松林、胡里庄、魏家湾为最大,仓上、吴坊、戴家湾集次之,大丁庄售棉花为全境之冠,其余小集姑不具载^①;山东高唐,“州境地处通衢,商贾集,城内与四乡著名市集如州市、梁村市、夹滩市、南镇市、北镇市、洹河市五六区(处)外,其余市集计有二十余区(处),以上六区(处)皆街市之大者,遇集期则四方辐辏,商贾如云”^②。实际上大集往往上述两个特征兼而有之。另外山根幸夫、中村哲夫认为有无牙行也是区分大小集的一个标志^③,这在清末到民国年间恐怕难以作为区分标准,因为牙行之设已很混乱,无论大集、小集,官府都设牙收税。一般说来,小集的交易范围只限于局部地区,以满足附近居民交易为要务,而大集规模较大,实际覆盖面积也较大,而且在集市数量增加、平均每集覆盖面积缩小的情况下,大集随其交易规模的扩大覆盖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如山东长清县许家寺市,光绪十八年以后“人烟辐辏,生息兴隆,济东之大道由此开,齐长之长途由此通,交通便利,届期百货为之俱全,贸易兴盛。该日三县(长、齐、历)为之争赶。至民国……富饶大商争来垄断,是以愈扩大,生息愈为昌盛,而人心亦为之开通,全县较之,遽然成为第一市场。”^④这样的大集自然在集市网络中处于较高层次,起到中心集市的作用,在其覆盖范围内包含着一定数量的小集,从而形成集市的层级结构。杨庆堃具体考察了山东邹平的集市等级结构。该地的集市可分为三等,“在活动的范围上,一等集最大,二等集次之,三等集最小,象是最基本的细胞,带着两个外壳”,“在功能上,每种都一律供给附近村庄的日常消费等功

① 民国《续修清平县志》卷5,《实业篇》。

② 光绪《高唐州乡土志》,《市镇》。

③ 中村哲夫:《清末华北的农村市场》,《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第184页。

④ 民国《长清县志》卷2,《輿地志》。

能,但除此之外,一等集包含着多量的发行买卖,供应从二三两等集来的小贩。因了发行的活动,故范围扩到很远,二等集也有发行的买卖,但只卖给三等集的小贩,数量亦较少。三等集则完全是为着供应几种简单的日常消费品。但如果不是最平常的日常需要,乡民们宁愿走远些到较大的一等或二等集上买去,因为那儿的样会多些,价格会贱些。”^①另外如前所述,大集与中小集在集期上是不重复的,但同层次的市场集期,特别是中心集市覆盖的不同方向上的低层次市场,其集期常有重复现象,说明这类低层次市场与另外的中心集市有较密切的关系,集市层级结构还表现出交叉现象。

当然,集市的层级结构与空间分布密度紧密相关,随空间分布密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空间分布密度上,山东较河北、河南密集,而山西则最稀疏;从不同的地形来看,平原、盆地较山区密集;从一定的区域看,山东西部、北部,河北中部、南部,河南中部、北部的华北平原,山西中部、西南部、东南部的平原-盆地地区集市较为密集,而某些山区集市分布相当稀疏,如河北西北部高原山区和山西北部,山西北部各县地广人稀,有的县甚至只有县城一个集市。集市越密集其层次性就越显著,反之就越不明显,因而像山西北部的一些地区就很难分析出集市的层次。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华北集市网络并不是均匀的,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

以上分析的只是集市的内在结构,实际上它与明清时期相比并没有多大质的变化,引起集市功能发生较大发展变化的更主要的动因是集市外在结构的变化,即在传统区域市场的基础上近代华北区域市场体系的形成。在近代华北地区,商品化的加速发展推动着整个市场体系的发展。天津、青岛等城市作为华北区域市

^① 杨庆 : 《一个农村市集调查的尝试》, 1933 年 7 月 8 日 《公报》。

场的中心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些重要的集镇，如山东的周村镇，河北的辛集镇、石门镇，河南的周口镇等，都是其附近区域内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与一些城市如山西太原、榆次、大同、临汾、侯马，河北保定、邯郸、张家口、沧州，山东济南、潍县、烟台、临清、济宁，河南开封、郑州、安阳、商丘等共同构成华北区域的中级市场。分布密集、为数众多的普通集镇与集市共同构成华北区域的初级市场。而近代华北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有了较大改善，除原有的水路交通如黄河、子牙河、大运河、小清河等河运外，又形成了全国最好的铁路交通网，平汉、津浦、北宁、平绥、胶济、陇海、正太、同蒲等铁路线较为均匀地分布于本区各地，各级市场通过便利的交通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一区域市场体系，既具有传统市场的功能，又具有现代市场的特征。一些商品仍保持着原有的市场并有所发展，如棉布，主要市场仍是东北、内蒙、西北等地，并有向江南扩展的趋势，而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工业的发展以及为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而形成新的市场流通系统，如棉花等向天津、青岛等地集散，以满足国内近代工业以及世界市场的需要，因而这一市场体系不再仅仅联系小生产者，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且也满足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具有资本主义市场的特征，传统市场向现代市场转型。同时，近代华北传统市场的转型也适应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需要，因而转型中的华北区域市场又具有了半殖民地市场的特征。市场体系的发育及转型，使处于市场体系最低层次的集市的功能和作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近代华北地区，集市的基本功能仍然是调剂余缺，满足小生产者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正常生活的需要，不过由于市场体系的发育，人们的这一基本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同时集市的其他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如前所述，华北地区人们习惯于定期的集市

交易,集市并没有因清末至民国年间商品化的发展、集镇的勃兴而衰退。一些商行乃至工厂到各集镇设庄、栈、行收购或销售产品,但这些庄、栈、行主要还是依托于集市来完成交易。如山东省长山县周村镇是一个丝织业中心,每逢集日,周村的机坊和机户便将产品售与镇上的绸缎庄^①;山东齐东县“共有集市九个:县城、吴庄、长福镇、双堂镇、张虎镇、延安镇、石店镇、路家镇及曹头庙。常有轧花商贩,自备轧花机,逢集市收买农民籽棉,轧成皮棉,装包用大车运张店或孙家镇出售。”^②集市的交易数额相当可观,如前述河北青县兴济镇的粮食交易,山东清平县大丁庄集的棉花交易,再如河北高阳织布区从1890至1910年间,“土线与棉布,皆于一定的集日于一定的集址进行交换:青塔镇……在每一集市售卖布匹之织工平均达400人,售布平均每集达1000匹;莘桥集每集约有布匹1000匹;大庄集约有1200匹;高阳城集约1242匹。总计全年布匹产额,四个中心合达357866匹,平均达89466匹。”^③这对于商人来说有利于集中时间进行交易,减少耗费,因而有更多的商人参与集市交易。山东掖县沙河镇是草帽辫的集散地,据1919年调查,沙河镇上的辫子市,每集约有200位麦辫商人从事收购活动。^④大量商人的参与以及更为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使得一些集市尤其是中心集市更充分地发挥着物资集散的功能,从而成为整个市场体系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一个重要环节。另一方面,集市所联结的不仅仅是小生产者,它还是联结小生产与大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集市既是各类农产物资集中并流向大中城市乃至世界市场的起点,又

① 《近代冀鲁豫乡村》,第393页。

② 吴知:《山东省棉花之生产与运销》,《政治经济学报》第5卷第1期,1936年10月。

③ 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纺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进程》,《中国农村》第1卷第3期,1936年。

④ 《近代冀鲁豫乡村》,第180页。

是工业品贸易的终点,是工业品的消费市场,因而对于近代工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同时集市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半殖民地市场的色彩,集市成为各国在中国掠夺原材料的起点,也是洋货在中国倾销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河北宁晋县各集“惟是花棉而外,贩洋品、奢侈品者较多”^①;昌黎“自海洋交通,洋布洋面及诸般洋货各市云集,货品为之一变”^②;而本世纪30年代,地处内地的山西“除固有的农具市场外,其他如人造丝织品、瓷器、五金杂货等,可以说是完全纯粹的日货市场”^③。无怪乎人们感叹:“观市场售品,除农具及家畜外,大多数纯系舶来品,此等市场,不啻为洋商作媒介,为他人作嫁裳,又安望挽回利权耶?”^④外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侵略中充分利用了中国的传统市场。

综上所述,华北各地集市的开市频率的主要类型自明清以来并没有多大变化,而平均每集的开市频率则有所变化,从明中叶以后到清代中期是不断增加的,而清末到民国年间未再增加,甚至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市场并没有突破定期性限制。另一方面,近代尤其是在清末至民国前期,华北商品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市场商品交易量增大,集市的数量也因之有了大幅度增加,集市空间分布更加密集。定期性集市的大幅度增加,使集市网络的层级结构更加分明,同时集市的外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华北区域市场体系逐步形成,从而使集市的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化,除满足小生产者的基本需求之外,在区域市场体系中成为集散物资、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国遭受外来经济侵略时,外国资本主

① 民国《宁晋县志》卷1,《封域志》。

② 民国《昌黎县志》卷2,《地理志》。

③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4-155页。

④ 民国《怀安县志》卷4,《建置志·市场》。

义势力并没有新创一个市场体系,而是充分利用了这一传统市场。在定期性集市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华北地区集镇勃兴,集市的发展和集镇的勃兴同步进行,集镇的勃兴并没有使集市黯然失色,这是华北区域市场发展迥异于江南地区的一个显著特色。

(作者龚关,天津商学院马列部讲师。天津
300400)

【责任编辑:徐秀丽】

《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出版

庄维民著,中华书局 2000 年 7 月版,53 万字。

该书主要内容由市场结构嬗变与商人资本兴替、产业改进与工业化进程、农业改进与农业经济变迁三部分组成。作者把市场变迁和产业改进作为基本的经济变量,从二者的发展脉络和相互关系入手,以新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了自 1862 年烟台开埠到 1936 年山东对外贸易、商路、市场、商品流通、商人资本、手工业、近代工业和农业变迁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了变迁的特点、影响和意义,并就传统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深层机制提出了若干新见解。